

可贵的尝试

——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与历史评价

倪 明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李海清

(东南大学 江苏南京 210018)

The competitive project design of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was an important in whic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s endeavored to combin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modernization, and these exploring made them get mature.

Key Words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competitive project desig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dernization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策划、方案设计竞赛、施工建造等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与分析,指出该作品是徐敬直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尝试将“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的一次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使得他们在专业上走向初步的成熟,原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建筑更成为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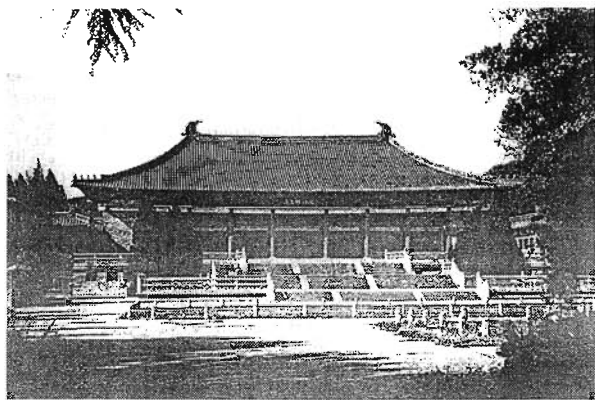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国立中央博物院 方案竞赛 民族性 现代化 探索

中图分类号 TU242.5

文献标识码 A

从1927年到1937年,六朝金粉的金陵古都作为国民政府统辖全国的政治中心,于短短十年之内兴建了一批“中国宫殿式”建筑,其类型有党政办公建筑、科研文教建筑、博览建筑、体育和文娱建筑、宾馆及官邸建筑等等。这些建筑的设计几乎全都以清宫式建筑为范本,其中唯国立中央博物院系仿辽代风格(图一),其古朴庄严的形象与其他“中国宫殿式”建筑大相径庭;其设计建造的坎坷过程也吸引笔者的兴趣;因为长年累月身处其中,同时又饱含着一份浓厚的感情,总想将她的身世弄清。

有鉴于此,经过对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笔者



图一// 国立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

收稿日期 2001-03-01

作者简介 倪明(1952年10月生),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博物院古建筑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海清(1970年7月生),男,安徽和县人,东南大学建筑系,讲师。

拟对国立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央博”)建筑方案征选过程及建造情况再现于世人面前,并对相关问题作出分析,略抒管见,以就教于同道。

一. 筹建背景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定都南京,史称“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首都的城市建设管理,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公布了《首都计划》。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界“保存国粹派”的双重影响及支配下,《首都计划》对建筑形式作了专门规定,力主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1]。此事对当时南京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前后相继建成了国民政府铁道部(1928年)、励志社(1929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1年)、中央体育场游泳池(1931年)、考试院(1931年)、小红山主席官邸(1932年)、国民政府交通部(1933年)等等“中国宫殿式”建筑。

此时,以蔡元培为首的知识界人士正在酝酿建造一座国家级博览建筑。他们认为“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之策源地”^[2]。由此,1933年4月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直属教育部,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3]。翁文灏、李济和周仁,分别任自然、人文和工艺三个展馆的筹备主任。当年7月又成立“央博”建筑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会”),翁文灏任委员长;委员有张道藩、傅汝霖、傅斯年、丁文江、李书华、梁思成、雷震和李济等9人。其中张道藩、傅斯年与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该会职权是保管建筑基金、选择建筑地址,审定建筑计划、监察建筑工作等。1935年11月,又成立“央博”理事会,聘蔡元培等13人为理事^[4],公推蔡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该会职权是推举院长,审议预决算,物品保管之监督、专门委员会之设立等。至此,人员调配整齐,班子系统配套,筹备机构已十分健全。

筹建建筑经费来源有二:即“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拨150万元,以及中央研究院拨付的补助费。1934年7月26日,“建委会”首次会议,即开始讨论征地。8月4日函请南京市政府,欲征收中山门内,中山路北侧的旧旗地为院址。次年4月,市府批复,谓已划定半山园旗地一百亩为院址^[5]。该地块南临中山路,东邻老旗街,西邻规划中的通向总车

站的城市干道;南北长468米,东西最宽处173米,西南为平面呈矩形的“遗族学校花园”,故整块基地为“菜刀形”,且由东南向西北渐低。

二. 方案征选与设计过程

梁思成作为“工程顾问”,审议关于工程各事项并草拟一切章程及契约^[6]。他拟订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征选建筑图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分为“图案之征集”、“图例”、“建筑师”和“建筑之需要”四章,详述方案竞赛组织机构、邀请建筑师、奖项设置、联系方式、评委组成、评审程序、基地状况、建筑投资、预算方法、图纸要求、合同签订、专门委员职责、营造商投标及管理、设备工程、建筑师费、建筑形式、建筑面积分配等重要事宜。规定总建筑面积为275000平方英尺(合25550平方米);建筑形式在不妨碍“近代博物院建筑之需要,并力求朴实及最大面积”的原则内,“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7]。

《章程》规定,此次方案征选的征集方式是“敦聘中华民国国籍之建筑师十三人参加”(即邀标)。这十三人是:李宗侃、李锦沛、徐敬直、奚福泉、庄俊、陈荣枝、陆谦受、童寓、过元熙、董大酉、虞炳烈、杨廷宝和苏夏轩。

《章程》于1935年6月5日发出,寄呈各建筑师,6月12日又补发一份“建筑地址平面图”。除苏夏轩因故未参赛外,其余12人皆按时交图。“建委会”专门组成“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委员5人,即张道藩、杭立武、梁思成、刘敦楨和李济。其中李、梁二人为预审委员。9月2日至3日,李、梁二人“逐图详加检讨”,因过元熙方案图上有“人杰地灵”图章,违背了《章程》中的有关条例^[8],被取消参评资格。其余方案,“则无一能与章程规定需要完全符合者,非估价超过预算,即面积不符应用”。9月4日,“审委会”全体委员决议“以比较最合用且有修改可能性者为原则”,逐一分析,考其优劣。其分析重点如下:(1)总图布置;(2)各馆平面布置;(3)各馆间的关系;(4)扩建可能性。后经反复研究,一致选出徐敬直作品为当选方案;陆谦荣获第二;杨廷宝获第三;奚福泉获第四;童寓获第五。

徐敬直方案当选后,遂进行方案修改。5个获奖方案中,有3个运用了“中国宫殿式”,而其中唯有杨廷宝方案为仿辽式。当时,梁思成尚未发现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已发现的最古老木构建筑为建于辽代的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于是梁亲自把关,指导徐敬直将方案由仿清式改为仿辽

式(图二)^[9]。徐据此绘制了第一期工程施工图。

三. 施工招标与工程状况

徐敬直建筑师还编制了工程预算和招标文件,经过招投标审议,1936年3月4月15日“建委会”选中江裕记营造厂为承诺商并签订合同。6月初动工兴建,至“七·七”事变时,工程已进行一年余。接着“八·一三”抗战爆发,工程只得于8月底“暂行停工”,直至抗战胜利。

当时工程进度合计约已完成一期工程总量之四分之三,如果顺利,再有半年就可完工。胜利以后,业主希望江裕记营造厂继续做下去,但有着黑道及政治双重背景的陆根记营造厂(厂主陆根泉)强行介入,抢过这块“肥肉”。此后因为内战,建筑经费不能正常到位,工程进度也受到影响。“中央博物院”至1947年才大体完成,直到5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完成“人文馆”之全部工程,即现南京博物院之老馆(图一)。

四. 建筑师及获奖方案的比较分析

所有参赛的建筑师皆属中、青年建筑师,都曾留学欧美,受过良好的建筑教育。其中最年轻的徐敬直29岁,其合作者李惠伯年仅26岁。另外,奚福泉已于1929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至少还有5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与9年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方案征集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10]。显然,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建筑类专业留学生陆续回国参与实践,中国建筑师的队伍迅速壮大,专业素质大幅度提升。

正式获奖的5位建筑师对于“充分采取中国式”所作的反应大相径庭。留美的三位皆运用了中国建筑“最显著的部分”^[11]——大屋顶,而留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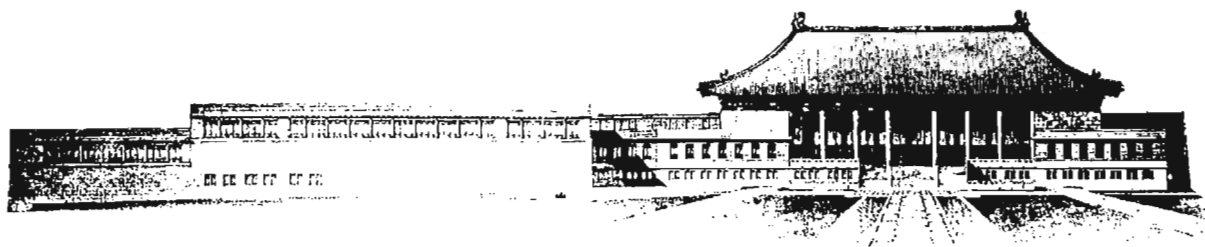
两位未用,尤其是奚福泉方案(图三~七)。今天虽无法考证奚在柏林工业大学时,该校是否已推行有别于“博扎”(Beaux Arts)的新建筑教育,但作为新建筑主要策源地之一的“包豪斯”已由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立。格氏领导下的“包豪斯”充满了具有各种思想政治观点的不同流派艺术家,并因此而常发生“内讧”,是常常引起保守势力疑虑的是非之地^[12]。这些都可能引起中国学子奚福泉的注意:即便是身在英伦的陆谦受,也可能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

因此我们推断,奚、陆二人因学习地点、时间与新建筑运动有密切关联,因而在建筑观念与设计方法上与三位留美同龄人(其中有两位是宾大的“博扎”传人)有着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奚福泉,他的方案“以中国式之红柱彩额,与广大墙壁配合”来体现中国韵味,故“审委会”褒奖他“至富创造能力,殊可钦佩”。另外,他在此次方案竞赛前的1934年,已设计并建成了上海虹桥疗养院(图八~九)可以充分证明他对新建筑的理解与实践并未停留于“样式”(Style),而已抓住其理性、真诚的精髓^[13]。奚福泉是将新建筑在中国积极付诸实践的建筑师之一。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奚没有“中国宫殿式”作品,这一点与当时其他几位新建筑的积极倡导者有明显不同。如范文照以及“华盖”的童寓、陈植、赵深,四人皆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受“博扎”影响至深,因而在思想以及实践上接近新建筑就有个转变过程,甚至经过“强烈的反省”^[14],可见求学背景对于建筑师影响之深厚。

获奖方案对两大设计难点之处理不尽相同。首先,如何利用“菜刀形”基地,营造庄严雄伟气势



图二// 国立中央博物院徐敬直方案最后修正辽式图



图三// 徐敬直方案南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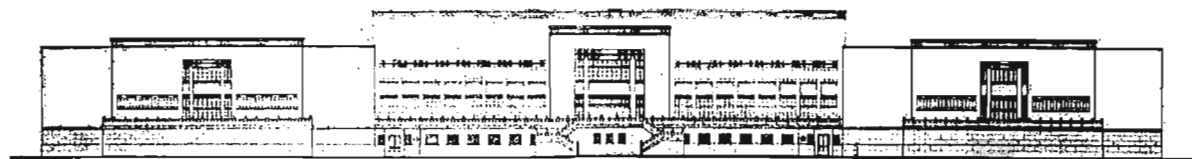


图四// 陆谦受方案南立面图



國立中央博物院建築方案雲南圖

图五// 杨廷宝方案南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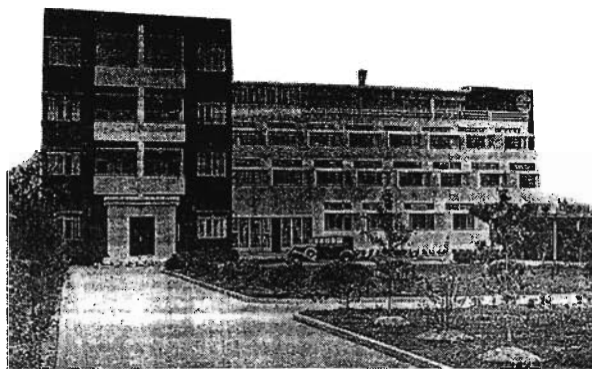
图六// 奚福泉方案南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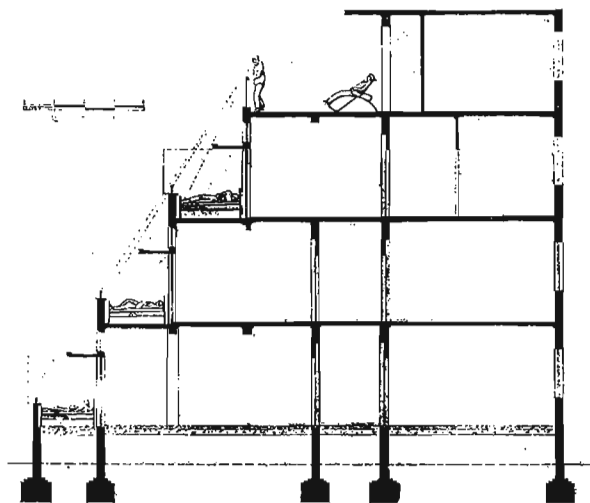
图七// 童寓方案南立面图

(以上四幅图片资料来源: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编印,《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报告》,1935年)

是颇为棘手的难题^[15]。以简图方式比较(图十),不难看出,徐案正好在这一点上占有绝对主动权。除徐案以外,其余四案皆将院舍主入口和主要体量设置于“刀片”部之中轴线上,这样势必产生由中山路刚进入“菜刀形”基地之“刀把”部分时,视廊轴线向东偏离建筑轴线(约50米)的问题,难以看到因体量对称而形成的庄严雄伟之效果。无论在总平面设计上做何种轴线转换处理,都对减弱和消除这种不尴不尬的第一印象收效甚微。最典型的是童案,“正门入口处太欠庄严”^[16]。徐案则另辟蹊径,将院舍主体及其出入口置于“刀把”之中轴线上,将三馆置于北部和西部,突出了建筑主体与城市道路和基地入口间的视觉对应关系,因而大受欢迎。



图八// 上海虹桥疗养院南面外观



图九// 上海虹桥疗养院剖面图

(以上两幅图片资料来源:《中国建筑》1934年第5期, Vol. 2。)

另外,预留扩建用地亦是难点。徐案在这一方面的缺憾显而易见,“审委会”评阅意见中关于徐案缺点的第一条即已指出此事,下文却又说:“一经修改之后,以上缺点,均可大致免除”,并最终授之以首奖。这肯定与其最突出的宫殿式形式和入口景观的庄严雄伟有关。

五. 方案评委的比较与分析

对5位评委进行分析,结合评选过程的史实,可以看出,梁思成起了极关键之作用。5位评委中,张道藩曾学过美术,与建筑学尚有些关联,而杭、李二位分别是政治学家与人类学家,和建筑学基本不沾边,因此梁、刘二人是以专家身份出现的。其中梁为“专门委员”,其位置比没有任何头衔的刘更显要些。另外,预审委员只有梁、李二人,对方案图至关重要的“第一印象”梁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可以推断,在9月4日全体审查委员进行初审前,已由梁思成在预审时定下基调。可以说,徐案获首奖与梁思成当时的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存在某种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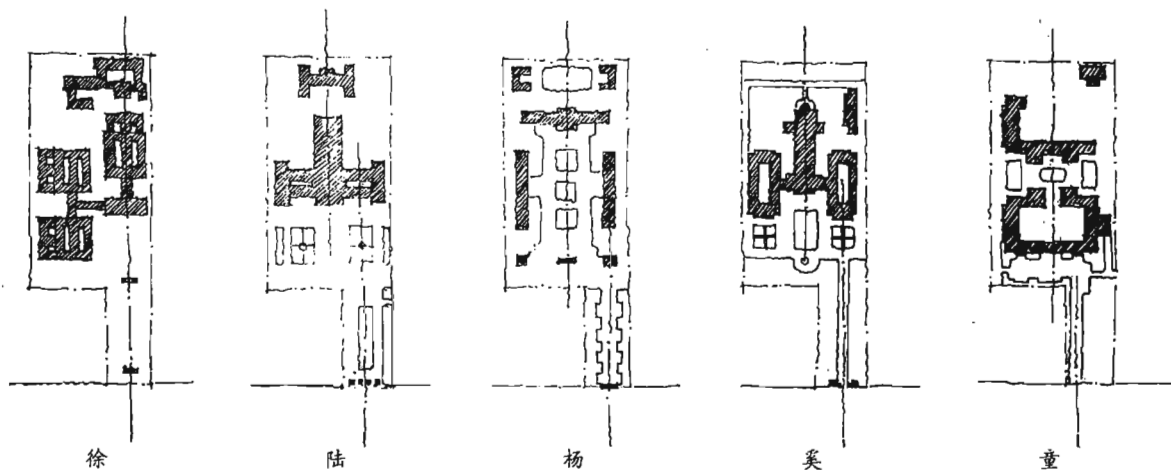
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五位评委无一人年届不惑(杭最年轻,刚31岁),皆为风华正茂、留学归国,在文化教育界处于前沿、担任要职的专家学者。这与9年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征选方案寄送美国建筑学会评审有天壤之别。

六. 结语

就总体而言,“央博”建筑设计在有依据地模仿中国古代建筑的同时,又能结合博览建筑的功能要求以及建筑基地的环境特点而有所变化,当属中国建筑师在30年代的较成功作品。关于此事,梁思成有如下评价:“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馆,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17]。

回顾60多年前的这次建筑方案竞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参赛建筑师还是方案评委,都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水平。有趣的是梁思成拟具的任务书中对建筑形式的要求并未采用当时通行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而是“中国式”,区区四字之差,却是良苦用心。梁思成后来的建筑思想轨迹(如“建筑可译论”)均以此“中国式”为主线,反映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将“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职业理想。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原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基础上成立的南京博物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几十年来,她为弘扬中华文化,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世界各地



图十// 获奖方案总平面示意图

的人民进行友好的文化交往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续建工程被提上议事日程,终于在1999年9月26日将新馆建成并正式开放。新馆的建成正促使南京博物院以前所未有的科学化、现代化、专业化硬件设置与软件管理与世界级博物馆接轨,走向富有挑战性的21世纪。

抚今追昔,我们不禁慨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1]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1929年。
- [2]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重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
- [3]傅斯年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系兼任。后因中央研究院事务忙迫,难以兼顾,遂于1934年7月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职,教育部改聘李济接任。见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第2页。
- [4]十三名理事为蔡元培、王世杰、胡适、黎照寰、李书华、秉志、朱家骅、张道藩、翁文灏、李济、傅斯年、罗家伦、顾孟余。见《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第2页。
- [5]因为筹备处方面感到用地紧张,而基地西面原定为中央图书馆址,该馆认为此地块狭长,营建诸多困难,遂在国府路另觅馆址。筹备处便呈准教育部转咨南京市政府划拨过来,于1936年5月获得批准,又征得93.3亩地。此时方案评审早已结束,即将开工。见《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第56页。
- [6]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5年。

[7][8][16]同[3][5]。

[9]梁思成得以及早发现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杨廷宝的鼎力相助有很大关系。1932年春,杨在北京鼓楼(时为民众教育馆)看到几张介绍蓟县风光的照片中有一张独乐寺的,其硕大独特的斗结构引起了他的注意,便立即通知了梁思成,梁看了照片后觉得“果然奇特”,马上改变了考察计划先去蓟县。此后,才有了那篇著名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发表,此次“中央博物院”方案征集,杨“投评委主任梁师之好,采取辽宋建筑艺术形式”,但“未考虑刀把形地形,采取一正两厢手法,功能关系不够理想”。梁思成对此抱憾之余,要求徐敬直改为辽式是可以理解的。见林洙:《建筑师梁思成》,第34~37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又见张饴:《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

[10]参加国立北平图书馆方案征选的建筑师21人,中国11人,欧美10人。最后获奖中标者为莫律兰(V. Leth-Moller)。见张复合:《国立北平图书馆建筑缘起》,《建筑师》总68期。

[11]童寓:《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公共工程专刊》第一集,内政部编印1945年。

[12]童寓:《新建筑与流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

[13]虹桥疗养院完全从使用角度设计,对于采光、通风、隔音减噪、视线干扰等均作了深入分析与设计处理,与医疗建筑之功能极相符合:内外空间及造型颇具新建筑之简洁、清新、明快之风。见中国建筑师学会:《中国建筑》VOL. 2 NO. 5 1934年。

[14]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章程》关于建筑设计要求虽未提到必须庄严雄伟,但从方案评语中可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设计要求。

[1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